

专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启动中国式金融改革

要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有两个方面比较重要:第一是防止金融业出现创新过度而形成自弹自唱的情况,美国的教训必须吸取;第二是创造服务实体经济的环境,从根本上解决如民间借贷、中小企业借贷难等问题,我们要实行中国式金融改革。

■本报记者 王敏

在产业空心化趋势愈演愈烈之际,金融业的暴利被视为罪魁祸首之一。随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呼声越来越高,银行体制改革迫在眉睫。中国的银行业该

朝哪个方向改?如何看待改革路径的争论?就这些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1 防止金融业创新过度

《中国企业报》:最近,有关银行暴利的报道频频见报端,在亚布力中国企业论坛上,经济学家更公开表示,中国不是缺钱,而是钱的配置出了问题,有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呼声越来越高,你怎么看待这种声音?

郭田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最近大家谈得比较多,媒体问的也比较多,都是在谈同一个问题。我有一个观点,从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作为金融产品,它的功能越复杂,衍生的层次越多,就会导致两个问题,第一是内在的风险性越大,第二是偏离实体经济的距离会更远。

我们要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有两个方面比较重要:第一是防止金融业出现创新过度而形成自弹自唱的情况,美国的教训必须吸取。第二是创造服务实体经济的环境,从根本上解决如民间借贷、中小企业借贷难等问题,我们要实行中国式金融改革。

《中国企业报》:美国的教训可能是创新过多,2008年开始了深受其害。中国的金融改革开了很多年,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在哪?

郭田勇:首先,我们要防止金融业剑走偏锋,大家注意到,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会产生问题:一是这里面的杠杆倍数非常高,容易把风险放大,本来买东西花一块钱只能买一块钱,现在花一块钱能买100块钱、1000块钱,就能够把原产品本身的风险放大;二是容易给风险机构转移手段,当风险转移手段比较强的时候,就会使金融机构的业务发生畸形的。比如说美国的次级债,金融机构为什么这么容易发放次级贷款然后再发债,就是因为有这种转嫁手段。贷完款,可以把风险转移走,让其他的公众、其他的投资者持有这个债,这样就可以乐此不疲地做这种包装,从而获得中间的收益。我们要注意防止这个问题。

我们在中国要防止金融创新的过度化,创新相对于美国所出现的金融创新的过度化来讲,我们也清楚,我们更多存在着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仍然还不够,我们在原生的基础性的金融产品的发展上、在经济金融工具的选择和使用上,还存在着很多的缺陷。

2 一枚硬币的两面

《中国企业报》: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呼声越来越高时,你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具体应该怎样做才更有效?

郭田勇:要让金融有效地服务中国的实体经济,未来有几件事情要做:一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二是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进一步开放市场。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说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开放市场准入,我一直认为二者应该是并行的关系,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假如我们的利率市场化没有改革,我们只是把金融机构、银行的准入门槛大幅度降低,这样就会大量吸引社会资本进来办银行,因为利率这么高,金融业就会形成一个黑洞,吸引社会大量资金往内涌,这也会出问题。

如果仅仅是市场化改革了,但金融准入门槛没有降的话,还是现有的金融机构在经营,利率市场化了,这样反而可能会由于现有的金融机构与大型的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导,反而会形成联合性的、相对垄断的状态。利率市场改革以后,贷款利率不但没有往下降,而是在往上升。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放松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降低准入门槛,两者应该是同步进行的。

《中国企业报》:你曾经表示,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之前,不应该推出中国的《巴塞尔协议III》。具体该怎么理解呢?

郭田勇:《巴塞尔协议III》的监管标准相对于《巴塞尔协议I》和《巴



郭田勇

塞尔协议II),有相对大幅度的提高,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在银监会也和监管机构的领导进行了讨论,学术性的专家可能认为太高的监管标准还存在一些质疑。

如果大家注意过我的观点,我在前段时间也谈过这个问题。我总是在担心监管标准过高,容易导致形成中国监管的形象工程或者是马其诺防线的问题,一方面是利率没有市场化;另一方面是金融监管机构没有放开,各家的银行盈利都非常高,各个银行的行长都把银行赚这么多钱认为是个人本事大的表现,盈利非常高,出现亏损、破产的可能性非常少。

《中国企业报》:也就是说,在利率市场化之前,再进一步加高风险资本防线,没有必要?

郭田勇:大家知道资本的意义是消化和吸收风险,但现在大家都这样搞,有这么高的防线,我担心会形成资本浪费。我提出一个建议,我认为银行和银监会可以进行协调,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之前,我们不应该推出中国的《巴塞尔协议II-I》。

利率市场化改革没有做,我们就能够判断到整个银行业对未来仍然会呈现持续高盈利的状态,这个时候再推《巴塞尔协议III》,进一步加高利率,这个必要性并不高。资本是为了应对风险的,我们在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前,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推出《巴塞尔协议III》设置那么高的资本标准,那么高的监管条件。

3 非对称加息和一升一降

《中国企业报》:现在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似乎还有难度。

郭田勇:当然,我也注意到,监管机构、央行有很多观点,利率市场化现在还是有一点障碍。银行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谈,还是不太行,从公司制约束上,还是不太够。但我感觉从国有银行以及其他中小银行的改革,已经搞了很多年,公司的治理水平总体是不断升高的。就像我们让一个人学游泳,总是在深盆里学,不让他有可能被呛水的可能,他始终是很难学会游泳的。

《中国企业报》:如果一时还到不了游泳池或者大海,那该怎么办?

郭田勇:你怎么判断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达到了非常高的时候,就能够放开利率?这个事情是很难找到一个最好的点。如果说我们认为现在利率是市场化,现在条件不是完全成熟。我们现在可以干点什么事儿呢?

可以先采取一些措施,把银行的利差水平先降低下来,或者是先缩一下,这个措施是可以的。

有几种方案,第一,可以非对称加息,存款利率下降,提一个点,贷款利率先不动。我们算过,如果利率市场化的准备,现在银行利差有3个多点,我减到0.5-1个点,这样银行的盈利大概总体能够减少三四千亿的量,因为现在盈利太高,遭到社会的诟病和指责也比较多,我们可以先做非对称加息这样阶段的事儿。

第二,可以采取一个加、一个降,把存款准备加0.5、把贷款利率往下降0.5,我认为可以先把这个事儿往下降一些。加强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设也很重要。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化,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降低以后反而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通过存款保险制度来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利益,这样对银行业的稳健经营也很重要。

存款保险制度有一个障碍,

在大小银行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相同,中国的几家国有银行通常认为不存在破产倒闭的可能性,所以存款保险往往是容易增加成本,从他们兜里掏钱保护这些中小银行,他们并不积极。

但大家要认识到,第一,存款保险是一种强制性的保险,并不是普通的商业保险,这在各个国家都是一样的。第二,如果只让中小银行加入存款保险,大银行不加入的话,可能会存在中小银行加入保险了,它的经营成本比大银行高,反而会使得中小银行发生道德风险,发生逆向选择,因为我的经营成本高,就会冒险做更高收入的业主,从而进行弥补,这样使中小银行出问题的概率会更大,由于存款保险本身是一种强制保险,同时又由于在中国而言,从整个金融业的角度考虑,还是应当让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加入才对。

《中国企业报》:中国的汇率和利率两个方面都在面临着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你认为这个顺序应该怎样排?

郭田勇:现在从央行来看,在汇率方面,我们感觉所做的工作大概是更多一些,但大家要看到,汇率要放开也是非常难的抉择。如果我们不把汇率设置为一种波动空间,如果完全放开,资金、资本自由流动,有时候对经济会带来冲击,振荡会更大一些。

由此,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不是在利率市场化问题上走得比汇率更快一些。因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利率市场化,风险在经济体内,我们可以烂在锅里,如果出问题,我们是国内的。而汇率,那是国际性的。

从利率市场化来讲,边际效益会更高一些,利率一放开之后,对储户、企业都会带来好处,汇率放开,无论是出现升值还是贬值,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我觉得尤其是对经济主体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中国金融改革呼唤“南巡讲话”

(上接第一版)

听说,著名律师、八旬老人张思之发表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公开信。在信中,张思之重点表达了两个观点:其一,吴英案募集资金大多流入当地实体经济,属合法经营范畴,故无诈骗行为;其二,“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状,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

这位老先生把矛头直指金融垄断,他不仅从法律而且从制度层面,对吴英案做出了剖析,尤其是第二条,当是案件争议之核心。

吴英问题的核心是金融体制要不要改革,金融权是放还是收的问题。这就跟“南巡讲话”的背景有些相近了。20年前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是,针对经济上放与收的问题去“讲”的,当前尚未顾及到金融问题。今天的金融问题也已到了“放”还是“收”的关键时刻,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又一个转折时刻已经到来。

放权与收权一直是改革路线的核心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自1970年代后期开始,整个1980年代都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当时称“商品经济”)之间摇摆。除了最初的农村改革很为成功外,其他各方的改革尽管都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突破口。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家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围绕这个目标,全国很快就进入动员状态,聚集改革力量,实施改革政策。“南巡”之后,由地方领头发动了一场激进的分权运动。1980年代也有分权,但其幅度和广度都比不上“南巡”之后的分权。“分权”释放出来巨大的改革和发展能量,有力地冲击了旧的体制,在很多方面打破了旧体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和制度基础。

如果说当年没有邓小平拨乱反

正,中国改革的一叶小舟可能向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可能向“左”的方向去走了。邓小平当时在1992年的时候说,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说法是非常厉害的,也只有他能讲这个话。

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思想正在转变成制度。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的,包括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等等。还有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制。“抓大放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所看到的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是没有这一过程,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出路。通过1990年代的改制,中国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经济结构,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

邓小平南巡讲话最大的遗产是什么?是改革精神,市场经济精神,放权搞活的精神。从关于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进一步发展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改革和改善包括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社会制度,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同时弥补和纠正市场经济机制的不足,使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得到全面和健康的发展。

关于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应该根据关于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所揭示的市场经济竞争机制或市场均衡(价格)存在的前提条件,改革和改善各种社会制度和习惯,使之尽可能地满足和符合这些前提条件。

首先,市场均衡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充分竞争。市场经济中的各个经济主体不能对市场价格的决定持有明显的影响力,资源可以在产业间和区域间自由移动,各个

经济主体能够公平地获得关于市场及价格的信息并可以自由地参加或退出市场的竞争。

由此可见,要让市场经济正常运作,必须控制垄断企业及个人的存在,减少和限制大型企业对企业类市场的独占,公开各种市场信息和社地部分企业和官员对信息的独占和操作。

其次,市场均衡存在的第二个前提条件是市场普遍存在,即要求市场经济中的所有生产要素和产品必须所有权及使用权所属分明,使用或消费这些要素和使用权时必须通过市场支付其价格,同时,这些市场普遍存在,其中的交换或交易公平公开。

显然,这20多年来,中国对国有企业所有制的改革和明确企业产权所在,建立和培育包括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内的各种市场,都是有利于满足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的。但是,这些方面的改革只是刚刚开始,还需要进一步地拓展和深化。今天,中国在很多方面也面临类似“南巡”前的状况,有一些方面例如金融方面形势则更为严峻。很多方面的改革止步不前,总是找不到突破口,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现象。

现在有个奇怪现象,有些地方口声声喊改革,但是改革总是“按兵不动”。政府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经常做两件事:第一就是作茧自缚。第二件事就是“逼良为娼”。如果没有地下钱庄,我们的民营企业不能到今天,地下钱庄为什么是非法的呢,因为没有法。地下钱庄如果能在阳光下操作,政府可以收税,可以监管、能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创造了就业,何乐而不为呢?其实民间资本力量大得很,只要我们承认它,容纳它,引导它,就可能为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

无论是2011年金融市场形势之要求,还是第四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所期许的主题,金融体制改革和推进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成了国内金融体系改革最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利率是金融市场资金的价格。如果该价格不能够通过有效机制来形成,既无法让利率成为金融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也谈不上有成熟的市场可言。可以说,近20年来,利率市场化一直是国内金融改革的核心。

毫无疑问,当前金融市场利率价格机制扭曲不仅表现金融资源无效配置,比如大量金融资源不是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涌入高风险的各种投资市场,从而导致国内不少弱质行业及企业严重的金融挤出效应;而且导致了金融市场秩序越加难以确立,比如民间高利贷盛行、影子银行泛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度扩张、商业银行的盈利高速增长、巨大潜在的金融风险不断地积累等。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推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已经迫在眉睫。与利率市场化同时做的事便是放开金融市场,吸收民资参与,形成市场经济的新金融体制。

当前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是条件成熟不成熟的问题,而是如何突破现有的利益集团与制度障碍把改革推进的问题。因为,当前完全扭曲了基准利率制度不仅导致整个金融市场资源配置严重的无效率,它也是一种为少数人利益服务而对绝大多数人利益掠夺的财富转移机制。这种机制的利益关系的路径相依已经成为当前金融市场推进利率市场化最大障碍。不打破这种利益集团阻碍金融改革的格局,国内利率市场化将对重要的障碍。其实,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指向很明确:一是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这是衡量金融工作

这种改革对金融市场所面临的冲击与影响的问题。

很难理解,一个吴英案能引起天下人关注,关注的程度不亚于对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纪念。

很好理解,一个吴英案能引起天下人关注,在于此时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时代要求极为相似。

一个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一个是垄断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同一个要求:放权搞活。

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更为艰巨的金融改革或许就要摸着脑袋过河。过河的路径已经很清楚,阻力相当强大。当然,不是每个过河的人都会淹死,但先驱中总有人会为此而牺牲,特别是没有护身符的民营企业企业家,牺牲的概率显然大得多。

我们与其煞费苦心让吴英成为民间信贷祭品,不如探讨如何对民间信贷开闸。如果此事映射出的地下金融特性能成为制定监管框架的依据,即是吴英之功。但愿这件事能唤起金融界对改革的反思,寻找对金融改革的反向推动力量。

资本无序泛滥的高利贷市场不能不管。在管的同时,则应考虑下一步政府如何放权,哪些权利应该放给社会,哪些权利政府应该紧紧地抓在手里,这是需要现在继续探索的。这也是当前金融改革的焦点。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与此相适应,是要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并且依次进入能源、交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这不仅能缓解经济发展的困难,而且能够推进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垄断行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而对金融垄断体制改革是焦点中的焦点。

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指向很明确:一是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这是衡量金融工作

好坏的标准。二是放活民间资本,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这是改革金融体制的实现途径。道路非常宽广,潜力巨大。

中国需要再一次思想解放,甚至说中国需要再一次思想启蒙,需要围绕集权与放权问题进行一次大辩论,寻求中国的改革的深层逻辑,它的大方向应该走向何方。当然,南巡不可能了,邓小平作为最后一个威权式的强人,我们只有在他身上才可以用南巡这个词。我们今天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需要提倡的是“南巡”精神。

需要弘扬“南巡讲话”精神,是因为走向市场的道路异常艰难,矛盾异常复杂。与20年前不同的是,现在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程度上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比是在放权问题上举棋不定,在搞活问题上左右为难,这类博弈的实际激烈程度超过了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领导干部对待改革的态度,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攻坚,比当年更加考验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和政性伦理。

中国社会进入又一个回归,回归到需要改革放权的时期,中国因此需要进行“南巡”精神的教育,这不仅是拯救金融体制改革,拯救企业,更是拯救我们的国家。

(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研究员,是中国农村第一个万元户的发现与报告者,邓小平在1982年12月听其汇报农村改革情况,对其有“你有发言权”的评价;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在当年第一个向中央写出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模型,得到多位领导批示。)